

## \*學人介紹\*

# 使中國的學術還歸中國的本土

——潘重規教授與敦煌學研究——

連 文 萍\*

## 一、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外國？

日本知名漢學家藤枝晃教授曾在大陸一次學術講演中說：「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外國」，亦即敦煌寶藏是在中國發現的，敦煌學的研究卻是在外國發揚光大，他的說法曾引起學界不小的震撼，許多人認為敦煌文物的流失已是國恥，敦煌學的研究仍落在人後，實在令人遺憾；然而，證諸民國初年學者陳寅恪教授所說：「敦煌學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則藤枝教授的話確實道出了敦煌學研究的部分事實。

自從西元1900年5月26日，道士王圓籙挖開石窟的泥壁，隱藏近九百年的經卷、文物終於重見天日，然而由於地處偏遠，並未得到清廷的重視，連甘肅學臺葉昌熾建議把這批珍貴文物運送省城保管，都因為必須花費五、六千兩銀子，而吝惜作罷，反而是西方學者風聞石窟的秘藏，紛紛蜂湧而至。1902年，曾在西域考察地質的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齊，在德國漢堡召開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提出關於敦煌佛教藝術的報告，把敦煌寶藏公諸於世。1907年，英國政府僱請匈牙利人斯坦因赴敦煌，循著洛克齊的足跡，他不但親見石窟的偉大，還結交了王道士，他把自己比喻為玄奘的信徒，從印度翻山越嶺而來，希望一睹藏經洞，崇敬玄奘的王道士不但聽信他的巧言，復在五百兩銀子的誘惑下，出賣了敦煌文物，斯坦因總共帶走了抄寫經卷二十四箱、繡畫藝術品五箱，共計九千件左右；1914年，他再度來

---

\*連文萍小姐，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到敦煌，經由王道士，又得到佛經五大箱六百多卷。繼斯坦因之後，1908年，法國伯希和到達敦煌，由於他具有漢學根柢，所以能在斯坦因劫掠之餘，購得更有價值的經卷寫本，尤其是語言學、文學、考古等方面的珍貴資料，共計六千多卷寫本和不少畫卷，他同時還把石窟編號，並偷攝其中的壁畫，後來出版了《敦煌圖錄》一書；最可笑的是，他押運劫取來的敦煌文物，途經北京，還予以公開展示，中國學者這才醒覺家產被人掠奪的事實，清廷也才於1909年正式撥款，收集敦煌文物，運送北京，而在運送過程中，不少經卷仍舊被盜，爲了輔合數量，不乏將長卷撕裂以湊足卷數，這些送到北京的卷子，只剩八千六百九十七卷，大部分是殘缺的佛經。之後，日本的橋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1911年到達敦煌，從王道士處又得到了五百卷佛經和部分唐代的彩塑；1924年，有美國的華爾納，以塗著化學藥品的布，硬生生的剝下二十多塊唐代壁畫，還劫取數尊盛唐的彩塑佛像，而敦煌的藏經洞早已空空如也。

敦煌在中國，文物卻飄零散佚，尤以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和巴黎國家圖書館典藏最多，其他日本、蘇聯等地亦所在多有，以致資料在國外，研究學者在國外，研究論著亦在國外以他國文字發表，這門學術遂在國外得到張顯和發揚，這就是日本藤枝教授所說的：「研究在外國」，也就是陳寅恪教授慨嘆的「傷心史」，然而，我們不禁要問，1992年的今天敦煌學的研究狀況依舊如此嗎？不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加入敦煌學的研究行列，成果日益輝煌，其中，堪稱臺灣敦煌學研究宗師的潘重規教授，更以數十年持續的努力，提出極多關鍵性、權威性的見解，復以教育後進的方式，培育研究人才；以辦刊物的實際行動，鼓勵研究論著以中文發表，他要敦煌學成爲道道地地的中國學術。筆者有幸親聆教授的教誨，並深切感受到他的學術熱忱，景仰其成就，特別於課餘走訪教授，嘗試了解他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心路歷程，探看他的研究成果，並從而鳥瞰敦煌學在臺灣發展、茁壯的軌跡。

## 二、奇妙的機緣

「我接觸敦煌學算晚的，先前有不少學者進行過研究整理工作，如王國維曾得到巴黎三個《切韻》卷子的照片，立刻加以手寫臨摹；而劉復到巴黎唸學位，抄得不少資料，也編寫了《敦煌掇瑣》，還指出王國維臨本的錯誤；姜亮夫從巴黎抄回的卷子更爲豐富，《瀛涯敦煌韻輯》一共四冊，線裝，非常精美。」潘教授第一次

接觸敦煌學，就是和姜亮夫教授有關，民國二十八年秋，潘教授應聘到四川北部三臺縣東北大學中文系任教，姜亮夫教授正好是系主任，有一次，他以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的照片見示，潘教授大開眼界，並借得照片仔細研讀，發現與今日所見《經典釋文》有所出入，原因是經過宋代刻書篡改延誤，失去該書的原貌，而這部唐人寫本《尚書釋文》正是最接近原貌的本子，可以訂正歷來研究者，如清代段玉裁、錢大昕等學者的訛誤，於是他寫了第一篇論文〈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發表在東北大學學報《志林》第二期，「這篇文章刊出後，各方反應不錯，像四川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向宗魯教授就寫信給我，大加稱讚，但我以後再也看不到姜教授的資料了。」潘教授回憶起這段往事，直嘆姜教授雖然先看見這份資料，卻沒有發現她的真正價值，反而把「發明權」給了自己，真是奇妙的機緣。

民國四十六年，潘教授任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曾受邀參加在西德麻堡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和在慕尼黑舉行的國際東方學會，便利用這個機會到歐洲各大圖書館訪書，之後，每逢暑假就到倫敦或巴黎，盡情披閱敦煌經卷。「我第一次看到敦煌卷子，心裏是非常激動的，那時我習慣性的先由經書看起，尤其是《詩經》，後來就寫成了《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民國五十六年的秋天，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專供學者研究的 Student Room，看到鄰座的馬淵和夫教授正以原卷校對姜亮夫教授的《瀛涯敦煌韻輯》，我心想，他真是太笨了，花這麼多的路費和時間，為什麼不去看些新的東西呢？因為我和姜教授是多年同事，知道他那本書中每個卷子都經過臨摹、抄寫、拍照，回國後再重新校對，似乎是十全十美，尤其他指出了王國維的錯誤三百五十餘條、劉復的訛誤二千條，可見確實很精密。一、二個星期後，日本學者離開了，我心裏一想，不妨也來試試，就選了該館所藏最重要的一份《切韻》卷子伯二一二九卷，與姜書對校，沒想到第一行就錯，原卷是『刊謬補缺切韻序 朝議郎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姜書不但漏抄，還在序文前面擅加『王仁昫序』四個字，把原來可以解決《切韻》作者是誰的最重要證據給抹去了，真是令我非常吃驚，於是我決心把姜書通校一遍，就這樣一直到民國五十八年，寫成《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發現姜書的錯誤實在不少，我也體認到從事敦煌學研究，必須兢兢業業，不可有絲毫的大意。」潘教授到海外訪書的次數，自己也記不清楚了，而其中的艱辛和孤寂，更是旁人無法了解的。

民國六十二年，潘教授赴巴黎參加東方學會，由於對於蘇聯所藏一萬二千個號碼的敦煌卷子，迫切的想要窺其究竟，於是決定會後應蘇聯漢學家孟西科夫先前的

邀請，到列寧格勒訪書。「不少人勸我不要去，因為那時候到共產國家，一定要坐牢，搞不好臺灣都回不去，我自己的心裏也是很猶豫的，前一天，我到公園打拳，正巧有一顆鳥屎掉到我肩膀上，照中國人的習俗，這不是好兆頭，但我千思萬想，最後還是決定不顧一切的闖向前去。」這次列寧格勒的訪書，明白了蘇聯的藏本編號雖多，實際成卷的只有三百多軸，而往年從小川教授抄來的一五一七號詩經卷子，實際只是半紙殘書。然蘇聯的典藏中不乏珍本，如《十吉祥變文》、《雙恩記變文》、《敦煌讚文》等，其中，《雙恩記變文》係根據《佛報恩經》演講，而由演講寫成變文，最足以證明變文的名稱和發展演變，潘教授為此特別撰作〈變文雙恩記試論〉予以詳細校訂和探討，而這次的訪書經過，也撰成《列寧格勒十日記》一書，以資誌念。

### 三、禍事變成美事

爲了訪書，潘教授除了能夠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他還能轉禍爲福，善於把握契機。民國六十五年八月，潘教授赴巴黎參加漢學會議，同時準備了研究計畫及資料，想要進行研究工作，沒想到，航空公司把他的行李箱遺失，身無長物，「這時我不免有些沮喪，湊巧西裝口袋裏還帶了一本胡適先生編的詩選，書後還附載了他晚年校訂的敦煌雲謠集，這本書本來是要消磨時間用的，這下子，鬼差神使的，我跟隨前輩無數詞家的腳步，也對這部中國最早的詞總集進行研究，在經過和原卷仔細對校之後，居然解決了不少問題，如〈鳳歸雲〉二首題爲『閨怨』，所以分寫在二首詞牌下面，羅振玉就以爲『閨』是『徧』字，而以『鳳歸雲徧』爲詞牌名；王重民則以爲『怨』字是正文，就把『怨綠窗獨坐』作爲第二首的首句，實在謬誤太甚。我因此影印原卷的全部照片，並校訂各家說法，寫成《敦煌雲謠集新書》，讀者可以查驗照片，自己權衡各家說法。」校完《雲謠集》之後，潘教授又借來王重民等輯的《敦煌變文集》，這部書是研究敦煌變文的權威著作，作者聲稱：「這可以說是最後最大的一次整理」，然而在潘教授的校讀下，發現錯誤極多，如伯三七八四卷的尾題應爲「已上祇園圖記」六字，「圖」即「圖」字的俗寫，但該書即誤作「已上祇園因由記」。這也使得往後五六個暑假，潘教授分赴巴黎、倫敦，以原卷親自校讀，終於完成《敦煌變文集新書》的鉅作。遺失行李本來是令人喪氣的事，潘教授不但淡然處之，還能因此而涉足新的研究領域，著書立說，確實是常人難及的，而後來行李箱也物歸原主，禍事真的成爲美事。

#### 四、發現《龍龕手鑑》的真價值

由於敦煌卷子多半是中晚唐五代時的抄本，字體潦草紊亂，俗字訛文、變體簡寫盈卷，成為研究上的最大障礙，早期學者對此不免存有鄙視的心理，以為抄手學識淺陋，不足信賴，因此動輒以己意臆改，造成衆說紛擾、莫衷一是的局面。潘教授以為，文字的發生、使用和流通，必定有個法則，也就是所謂的「約定俗成」，敦煌的俗寫文字一定也有條理，所以在民國六十六年，因為任教中國文化學院中研所的「敦煌學研究」課程，得以集合學生合力編成《敦煌俗字譜》，歸納出當時「宀穴不分」、「瓜爪不分」、「木才不分」的一些用字習慣，「其實俗寫文字的道理很簡單，就像我們今天，大陸使用簡體字，臺灣這邊的人不一定看得懂一樣，中晚唐五代他們也有獨特的書寫習慣，如果不去虛心觀察，一味站在現代的角度去批判，是會誤導研究方向的。」潘教授在敦煌文字學的另個重大成就，是發現了《龍龕手鑑》的真正價值，這部字書是遼僧行均根據寫本《佛藏音義》所編，而《佛藏音義》的寫本正是俗寫文字的淵藪，但清儒錢大昕曾批評《龍龕手鑑》中「文、支不分，白白莫辨，崑崙入於山部，鬪門入於門部」等等錯亂的情形，以為「污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掃地盡矣。」（〈龍龕手鑑跋〉），李慈銘、羅振玉等亦曾指出該書辨認文字的錯誤，潘教授卻由此得到啟發，他看到錢大昕攻擊《龍龕手鑑》的缺點，和敦煌俗寫文字的混亂情形一致，於是悟出行均正是根據當時流行的寫本來編纂字書的，因此《龍龕手鑑》就是校讀敦煌卷子的最佳工具書，這個論點一經發表，震撼了學界，《龍龕手鑑》終於由無用變成有用，潘教授也可謂行均的千古知音。

#### 五、以治學細密超越前人

敦煌學不是一門孤立的學問，而是牽涉了經、史、子、集各個學門的學問，潘教授說：「張之洞曾說讀書先求善本，敦煌所藏的就是最好的善本，我們現在對於宋版書寶貝得不得了，敦煌的經卷都是唐五代的寫本，你看，她的價值有多高！何況經過歷代刻書的篡改訛誤，書籍的內容多有不同，敦煌經卷較為接近原貌；更不用說，保存了不少失傳已久的文獻，以及其數量之多、包藏之富了。」因此，在潘

教授之前，不少中外學者投入了敦煌學研究，而潘教授尤能以治學的細密、不懈的努力，創造不少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當問起他的論著為何喜歡以「新編」、「新書」命名時，他說：「我有一個觀念，學問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時代做得完的，應該是接力的、整體的，具有綿延不斷的生命。今天，我補充前人的說法；明天，我也盼望別人來補充我的說法，大家都是為學術服務的工作人員，我跟著前人的腳步走，他們已有成果，我為什麼要予以抹煞呢？所以，我在《敦煌變文集新書》的〈引言〉中說：『新書以舊書為基礎，舊書也包含在新書之中。不僅增添舊書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個人的新說法。新舊同時陳列，讀者展卷瞭然。新舊材料的異同，自可明察；新舊說法的是非，自易判斷。』」而當問道，如何在前人立說中發現問題，尤其是大牌學者已成為權威定論的時候，潘教授笑著說：「我讀書都是直接先看原典，發現問題時，自己先思考解決，再去看看前人的說法，如果和自己的見解主張不出，則予以分辨，覺得自己比較正確則予以發表，像舉世都承認胡適先生所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作品，我就主張不是，並且認為這是一本反清復明的小說。研究敦煌學亦是如此，像〈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一文中，我就提出不少和前輩陳寅恪教授不同的看法，加以補充修正。」

## 六、使中國之學還歸中國之文

研究敦煌學，對文物的流失、國內學者研究的困境，潘教授一直深有感觸，尤其陳寅恪教授曾說：「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這一席話，尤其令他感動，於是他在奔走呼籲各國聯合編纂敦煌遺書總目錄、敦煌論文著述總目錄，呼籲國內成立敦煌研究資料中心的同時，更身體力行，以辦刊物和開課程的方式，讓敦煌學在中國紮根，「我認為敦煌學是中國的學術，研究成果應以中文發表，所以與國內外友人共同創刊《敦煌學》雜誌，欲使中國之學，還歸中國之文，因此凡刊用的文章一律用中文，即使邀請外國學者執筆，也一定譯成中文；這份雜誌不發稿費，卻得到饒宗頤、吳其昱、陳祚龍、蘇瑩輝、隋麗玫等許多學者的賜稿，也培育了不少年輕學者，到今天，已經發行了十七期，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我又想到，要發皇一門學問，必須要有優秀的人才通力合作，因此又在二十年前大膽的在中國文化學院中研所開設『敦煌學研究』的課程，我告訴學生們：

『正常的課程，是餐館掛牌的名菜；敦煌學這一從未列入正式菜單的課程，只能說是一羣好事之徒，登山涉水，在荒涼原野中，臨時張羅的野餐。這份野餐，可能粗劣不堪入口，也可能是從未嘗到的異味。不管結果如何，但同甘苦，共勞逸，有飯大家喫的精神，總是可以肯定的』，這麼多年來，有不少傑出的學生出來共同努力，我最感到安慰的是，敦煌學已成爲文化大學中研所的一項重要研究特色了。」

## 七、使中國的學術還歸中國的本土

今年八十四歲的潘教授，談起畢生從事的敦煌學研究，神采飛揚，笑聲朗朗，他剛完成一篇〈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預計在今年九月吐魯蕃舉行的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在這篇文章中，他駁斥近代學者視倫敦所藏斯五四七五的《壇經》爲「惡本」的說法，並徵引敦煌俗寫文字的條理，說明此藏本實乃非常接近原本的抄本；他同時駁斥胡適先生視《壇經》爲神會所偽造的說法，並詳舉力證予以說明，論點均極具功力，亦可見寶刀未老。

民國七十六年，潘教授曾在〈我探索敦煌學的歷程〉一文中自比爲園丁，他彷彿置身在敦煌學一片廣闊的園地中，帶露荷鋤，蒼茫四顧，沈吟著謝靈運「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的詩句，期待著更多繼起的園丁來共同耕耘。「現在的研究環境好些了，有各種敦煌卷子的照片、影本和各種研究著述，臺灣大都看得到，學者不必像我一樣四處奔波，我建議年輕人不妨先由照片、影本看起，去發現問題，如有疑問則累積起來，有機會再到國外親閱原卷，尋求解答。」在這條學術研究的漫漫長路中，如何才能不懈的堅持下去呢？潘教授認爲從事學術工作最大的滿足，就在於學術上不斷的發現和創見，他說：「人生除了內心滿足喜悅之外，還有什麼？而如何讓自己滿足喜悅呢？那就是不斷的研究和發明。」敦煌文物的飄零散佚，已成爲國人心中永遠的隱痛，潘教授數十年所致力的，除了著書立說之外，最主要是在於振興敦煌學的研究，培育繼起的人才，他要使中國的學術還歸中國的本土，這也就是現代學者如何以學術研究「收復失土」的最佳典範。

## 潘重規教授敦煌學論著目錄

輯錄／連文萍

### 第一部分·專書

- 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 新亞研究所 1970年9月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 新亞研究所 1970年9月  
瀛涯敦煌韻輯新編 新亞研究所 1972年 又：文史哲出版社 1974年6月  
瀛涯敦煌韻輯別錄 新亞研究所 1972年 又：文史哲出版社 1974年6月  
列寧格勒十日記 學海出版社 1975年1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76年12月  
敦煌雲謠集新書 石門圖書公司 1977年1月  
敦煌俗字譜(主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78年8月  
敦煌唐碑三種(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79年5月  
敦煌詞話 石門圖書公司 1981年3月  
敦煌變文論輯(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81年12月  
敦煌變文集新書(上、下)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1983年7月、1984年1月

### 第二部分·單篇論文

- 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 志林 2期 1941年2月 又：學術季刊 3卷3期  
1955年3月  
略談巴黎所藏敦煌卷子 新亞生活 10卷13期 1968年1月26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 新亞學報 8卷2期 1968年8月 又：敦  
煌學 2期 1975年12月  
敦煌毛詩詁訓傳殘卷題記 新亞學術年刊 10期 1968年9月 又：收入《壽羅  
香林教授論文集》



- 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邈毛詩音新考 新亞學報 9卷1期 1969年6月
- 巴黎藏毛詩詁訓傳第二十九第三十卷題記 東方文化 7卷2期 1969年7月
- 巴黎倫敦所藏敦煌詩經卷子題記 新亞學術年刊 11期 1969年9月
- 敦煌詩經卷子之研究 華岡學報 6期 1970年2月
- 倫敦藏斯二七二九號暨列寧格勒藏一五一七號倫敦卷子毛詩音殘卷綴合寫定題記  
新亞學報 9期2卷 1970年9月
- 倫敦斯一〇號毛詩傳箋殘卷校勘記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 1970年9月
-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序 華僑日報 1971年12月1日 又：木鐸 3、4期  
合刊 1975年11月；華學月刊 52期 1976年4月
- 敦煌學的現況和發展 新亞生活 15卷9期 1973年1月20日 又：收入《列寧  
格勒十日記》附錄 1975年
- 瀛涯敦煌韻輯別錄 新亞學報 10期下 1973年7月
- 變文雙恩記試論 新亞學術年刊 15期 1973年9月 又：收入《列寧格勒十日  
記》 1975年
- 瀛涯卷煌韻輯新編序 中華學苑 12期 1973年9月 又：木鐸 2期 1973年  
11月
- 我國在列寧格勒的國寶 幼獅月刊 38卷6期 1973年10月 又：收入《列寧格  
勒十日記》 1975年
- 敦煌學第一輯發刊辭 敦煌學 1期 1974年7月 又：華學月刊 34期 1974  
年10月；創新月刊 138期 1974年12月
- 瀛涯敦煌韻輯拾補 新亞學報 11期上 1974年9月
- 敦煌寫本祇園圖記新書 敦煌學 3期 1976年12月
- 韻學粹金 幼獅學誌 14卷2期 1977年5月
- 敦煌雲謠集之研究——中國第一部「詞的總集」之發現與整理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10卷5期 1977年5月
- 敦煌學的瞻望與創新 嶺南大學開校三十周年紀念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1977年5月  
又：華學月刊 69期 1977年9月
- 敦煌賦校錄 華岡文科學報 11期 1978年1月
- 敦煌變文新論 幼獅月刊 49卷1期 1979年1月 又：收入《敦煌變文集新書》  
附錄 1984年

- 「偶然」的影響（上、下） 臺灣日報 1979年5月14、15日
- 敬悼戴密微先生 敦煌學 4期 1979年7月
- 敦煌詩經卷子拾零 敦煌學 4期 1979年7月
- 〔不知名變文〕新書 敦煌學 4期 1979年7月
- 敦煌寫本衆經別錄之發現 敦煌學 4期 1979年7月
- 敦煌變文集四獸因緣訂定 大陸雜誌 59卷4期 1979年10月
- 敦煌俗字譜序 華學月刊 95期 1979年11月
- 一字萬金 中華日報 1979年11月7日
- 完整無缺的山花子詞 臺灣時報 1979年11月14日
- 敦煌寫本曲子孟姜女的震盪 中央日報 1979年11月28、29日 又：東方宗教  
55期 1980年7月
-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研究 幼獅學誌 15卷4期 1979年12月 又：敦煌學  
13期 1988年6月
-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新書 木鐸 8期 1979年12月
- 天真質樸的敦煌曲子詞 中華日報 1979年12月12日
- 敦煌詞不可輕改 中央日報 1979年12月17日
- 敦煌寫本唐昭宗菩薩蠻詞的新探 中央日報 1980年1月26、27日
- 瀛涯敦煌詞話 華學月刊 98期 1980年2月
- 敦煌愛國詞 中央日報 1980年3月5日
- 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 華岡文科學報 12期 1980年3月
- 論敦煌本唐昭宗菩薩蠻詞答毛一波先生 中央日報 1980年4月1、2日
-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分類索引 文藝復興 111期 1980年4月
- 變文雙恩記校錄 幼獅學誌 16卷1期 1980年6月 又：東洋研究 57期  
1980年
- 敦煌詞史 中央日報 1980年7月5日
- 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 孔孟月刊 215期 1980年7月 又：木鐸  
9期 1980年11月
- 補全唐詩新校 華岡文科學報 13期 1981年6月
- 敦煌變文與儒生解經 靜宜學報 4期 1981年6月 又：收入《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 1983年

-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影印流通的貢獻 漢學研究通訊 1卷1期 1982年1月
- 敦煌押座文後考 華岡文科學報 4期 1982年6月
- 瞭解敦煌獻詞 自立晚報 1982年6月7日
- 敦煌閩人詩篇 自立晚報 1982年6月11日
- 敦煌變文集新書引言 敦煌學 5期 1982年9月
- 我探索敦煌學的歷程(上、下) 中央日報 1982年10月3、4日 又：創新410期 1982年12月6日；敦煌學 13期附錄 1988年6月
- 龍龕手鑑與寫本刻本之關係 敦煌學 6期 1983年6月
- 龍宇純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拾遺 華岡文科學報 15期 1983年12月
- 龍龕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 敦煌學 7期 1984年1月
- 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 敦煌學 8期 1984年7月
- 簡論「王梵志詩校輯」 明報 8期 1984年 又：中央日報 1984年8月16日文藝評論第21期
- 「王梵志詩校輯」讀後記 敦煌學 9期 1985年1月
- 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解答全唐詩不收王梵志詩之謎 中央日報 1985年4月11日文藝評論第54期
-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漢學研究 3卷1期 1985年6月
- 張曉峯先生對敦煌學之啓導 敦煌學 10期 1985年10月
- 書評——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目錄第一冊 敦煌學 10期 1985年10月
- 國立中央圖書館選展館藏敦煌卷子鈔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訊 8卷4期 1986年2月
- 讀「雲謠集考釋」 敦煌學 11期 1986年7月
- 簡論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 孔孟月刊 25卷12期 1986年8月
- 敦煌王梵志詩新探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1986年8月 又：漢學研究 4卷2期 1986年12月
- 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國際敦煌土魯蕃學術會議論文 1987年6月
- 關於雲謠集新書敬答任半塘 明報月刊 1988年10月
-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讀後記 敦煌學 14期 1989年4月

敦煌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 孔孟月刊 28卷1期 1989年9月

讀項楚著「敦煌變文選注」 敦煌學 16期 1990年9月

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 吐魯蕃敦煌學國際研討會預備發表論文 1992年9月